

王新龙  
编著

# 大唐王朝 1

中国戏剧出版社

轧中遭到削弱。这种削弱的因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个是战乱之中的打击。如南朝梁简文帝时期的侯景之乱，使侨居江南的名门大族，消亡殆尽。唐朝诗人刘禹锡“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的诗句，就非常形象地刻画了这一时期世事的沧桑变化，名门起伏急剧的景象。另一个是国家政策的限制。如南朝从刘宋以来，使“寒人掌机要”，即让出身寒门之家的人掌握国家枢密之权，含有在政治上限制士族势力的倾向；实行“土断”和“检籍”，将由北方南迁的豪门士族，一律编入当地户籍，与土著居民同等待遇，并检查户籍有无诈冒脱漏等情况，含有在经济上限制士族势力发展的意图。北魏开始实行的“均田制”、西魏实行的“擢贤良”等政策，也都有从经济上和政治上限制豪门士族势力的意思。在这两个因素的交互作用下，强盛的士族门阀势力逐渐衰落，统一的社会障碍逐渐排除。

边疆诸少数民族进入内地，并纷纷建立独立的或相对独立的政权，是形成魏晋南北朝分裂割据状态的又一个重要因素。晋室南迁，在很大程度上是受逼于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少数民族的内徙；晋室南迁之后在北方领土上出现的“十六国”，大都是这些少数民族建立的，之后统一北方的北魏政权，也是鲜卑族一支的拓跋氏。在内徙各少数民族逐步封建化的过程中，他们既大量吸收汉族的封建文化，同时也以自己的文化习俗影响汉人。到隋初，原先进入汉族地区的诸少数民族，无论在经济生活还是语言风俗等方面，都已基本上和汉族合流，以至后来的历史学家只能从他们后裔的姓氏郡望上来考知他们族性的渊源。各民族的大融合，为统一帝国的重建创造了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

在民族融合的过程中，北方和南方的经济文化联系也越来越紧密。北方在北魏中期孝文帝改革之后，社会经济有了明显的发展。南方的农业生产在这个时期也有了很大的提高。在南北方经济恢复发展的同时，商品交换等经济文化联系越来越普遍。北方的洛阳、长安等城市，成为南北贸易的重要商业城市，“南货”成为北方畅销的商品。当时洛阳城南的“四夷馆”附近住有万余户外来人，销售外地运来的或外地

人经营的各种商品。南方的长江沿岸及三吴地区，商业也非常活跃。当时的成都，不仅是西南各族交换商品的重要市场，而且吸引了远方商贾，西域商人也经由凉州前来贸易。在沔水（汉水）和淮水沿岸，南北贸易也日益增多，军吏和商人以寿春（今安徽寿县）为中心，交换各自需要的货物。南北经济的发展及其紧密的联系，造成了全国重新统一的物质前提。

随着统一诸条件的逐渐成熟，统一的斗争也开始进行。经过一系列曲折复杂的过程，最后由隋文帝完成了这一大业。

在隋文帝统一全国之前，被迫南迁的东晋统治者，曾进行过多次统一的努力。如晋元帝时，侨居南方的原北方大族祖逖请命北伐，他以弱小的兵力，乘北方统治者内部冲突之机，收复黄河以南的领土，并使后赵的统治者石勒因害怕而求和。后来因南北土著势力的挟制，功败垂成。祖逖北伐之后，庾亮出兵受挫，殷浩北伐无成，桓温始胜终败，刘裕北伐进到长安，但因部下在长安内讧起来，终为夏主赫连勃勃所败。到了南北朝时期，双方时有攻战举动，北朝不能完全征服南朝，南朝也不能完全征服北朝，虽然这种武力统一的努力都没有获得成功，但清楚地反映出统一是各方各阶层都向往的趋势。而且这些努力在客观上加速着统一的进程，不管这种统一最终以何种方式实现。

公元578年，已经统一了北方的北周王朝的军政大权落到外戚杨坚（即后来的隋文帝）手中。两年之后，杨坚取代北周，建立隋朝，并积极为进军江南、统一全国做各项准备工作。由于隋朝在隋文帝杨坚的统治下，国力蒸蒸日上，远远超过了江南的陈朝；同时也由于经过长期的民族斗争和民族融合以后，南北对立所具有的民族矛盾的性质已基本消失，隋朝统一全国的战争非常顺利。公元588年，隋文帝的二儿子、晋王杨广统帅50万大军，分五路，向江南的陈朝发动总攻，次年（589年），一举攻下建康，消灭了陈朝。接着又陆续摧毁了南方各地分散的反抗，平定了南方全部州县。这样，长期以来的南北分裂局面宣



隋文帝杨坚

告结束，统一的封建帝国重建。

隋帝国建立后，隋文帝杨坚励精图治，政局比较稳定，国力日益强盛。但到了隋炀帝杨广当政时，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加剧，人民群众的负担加重，在统一的封建帝国重建不久，各地的农民大起义就很快爆发，统治集团内部的实力人物也纷纷起来逐鹿中原，隋王朝迅即土崩瓦解，全国重又陷入分裂混乱之中。这时隋朝的太原留守李渊，乘机起兵，打

败了各地的割据势力，镇压了农民起义军，统一了全国，开创了唐朝近 300 年统一帝国基业。

隋末的战乱与秦末极为相似，都是在统一帝国后不久发生。又都是旋发即终，重归一统，从此出现近三四百年的统一局面。所谓秦隋二世而亡。汉唐数百年一统，说的就是这个历史现象。

唐朝近 300 年的统治时期，也并非一帆风顺，没有波澜。唐朝前期政治总的来说比较清明，社会也比较稳定，由“贞观之治”到“开元盛世”，走的是上坡路。但同时，孕育着衰败分裂的因素。开元、天宝之际，即由盛转衰。“安史之乱”就是这一转折的标志。在这之前，唐王朝是中央高度集权、统一的帝国，与边疆各民族的关系处理得也比较好。“安史之乱”以后，国家内部分裂的局面已经出现，中央统治的无力，藩镇的割据与相互间的攻战，使昔日的帝国处在风雨飘摇之中。与边疆各民族的关系，也呈现出错综复杂的局面，总的看，是摩擦多于和睦，受逼多于控制，且与藩镇之间的相互利用与争夺交织在一起，摇荡着唐朝的江山。但无论是藩镇割据，还是少数民族的进逼，终唐

之世，没有出现像两汉中间的那种王朝更迭，一统帝国的形式保持始终。在唐末农民大起义中，在藩镇割据基础上出现的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也没有像汉末出现的分裂局面那样持久。汉末之后的分裂长达400年，唐末之后的分裂只有60年，这表明，秦汉开创的统一事业，经过隋唐的加工之后，已基本定型了。

## 封建制度的沿革

隋唐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中的一个承前启后的时期，隋唐各项封建制度的演变，也更多地带有承前启后的色彩。这一时期封建制度的沿革兴替，对当时的经济社会的发展具有直接的推动作用，同时也透露出治乱兴衰的种种信息。

在经济制度方面，这一时期在土地、户籍、赋役制度建设中着力较大，其主旨是促进封建经济的恢复与发展，保障封建国家的各项收入。

隋初颁布均田令，其主要内容与北魏、北齐、北周的均田制相近，但隋初均田制实行的程度和范围如何，史学界至今尚有争议。隋末唐初的战乱，使人口锐减，大量土地荒芜，因此唐初也曾颁行均田令，规定人民所耕田地，由政府分等级授予。但到唐中叶后，由于国家行政管理的懈怠，版籍不实，土地兼并情况较为普遍，均田制逐渐名存实亡，到“安史之乱”后，便不复存在了。

与均田制互为表里的，是户籍制度的沿革。隋初，为了改变前代户口管理混乱状况和推行均田制，下令在全国“大索貌阅”，颁布“输籍定样”。即由州县官吏检查隐漏户口，并按照户籍簿上登记的年龄和身体状况，与本人相貌核对，以防谎报年龄，诈老诈小。由中央确定划分户口等级的标准，作为征收租调的依据，颁布到各州县，每年正月评定一次。同时，将全国人口分乡村与城市，编为党（族）、里（间）、保组织，各级组织的负责人，对本级组织中户口不实、租调不纳等问题，负有连带责任。到了唐代，则明确规定每年一造计帐，每3年一造户籍；并将全国人户按资产和人丁等情况，划分为3等（后改为9

加强和巩固中央集权的封建统治，提高政治运作的效率和质量。

隋唐时期官制的渊源，有两个方面：一个是汉族政权方面的历史来源；另一个是少数民族政权方面的外部来源。隋初，隋文帝就对南北朝后期的制度加以整理，建立起一套相当严密的统治机构。隋开皇元年（581年），废北周的六官制度。建立三省六部制度。隋开皇三年（583年）改革地方官制，取消北齐、北周的郡一级建制，实行州县两级制，省并了不少州县，裁汰了一些冗官，以便节省国家开支，提高行政效率，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唐代的中央官制，基本上沿用隋代之制，不过更为完备、周密一些，中唐以后，又有所变化。地方初沿隋朝州、县两级制，后来出于监察的需要，将全国划为10（后又为15）个道，起初由中央临时派员行使单项职能，后来演变为一级地方组织，形成实际上的道、州、县三级制。

这一时期的法制渊源，也同官制一样，既有历史上汉族政权方面的旧制，又有西北诸少数民族政权所创的新制。隋朝大的立法活动有两次。一次是在隋文帝即位之初，命大臣高士心、苏威等人，参照前代法律，制定和更定新律，形成《开皇律》；另一次是在隋炀帝时期，制定了《大业律》。《开皇律》和《大业律》基本相同，而前者优于后者，因为它斟酌损益，取适于时，其篇章体例和基本精神，为后世所遵循。律以外，令、格、式等法律形式也已出现。唐朝的立法活动比较频繁，其中大的立法活动有十多次，法律形式也空前完备。前期的立法活动以修律为主，兼及令、格、式，后期则主要是编敕和刑律统类。其中最有影响的是《永徽律》及《律疏》，现存《唐律疏议》即是永徽律疏。此外，唐玄宗开元年间完成的《唐六典》，是系统地记载唐朝官制的行政法典，对后代的行政立法也产生了重要影响。从司法角度看，隋唐时期比较开明的统治者，都比较重视严格、划一、审慎的原则，以解决社会矛盾，维护封建统治；而一旦统治者放弃这些原则时，社会的无序状态就随之而来。

汉魏以来，实行“九品中正制”的选官方法，后来流弊严重。隋朝建国后，隋文帝为了加强中央集权，限制门阀势力，于开皇年间取消“九品中正制”，用分科考试的科举制选拔人才。但当时的科举制还处在萌芽状态，只有常选和特选两种，并不经常进行，各科的考试内容和方法，也未形成制度。唐朝继承了隋朝的这一制度，并逐渐加以充实、完善，通过科举考试制度，笼络和选拔了一批批有用的人才，改善了官场和吏制的状况，有利于削弱汉魏以来士族门阀对仕途的垄断，巩固和加强了中央集权；同时也使一大批有志于仕宦的知识分子的思想局限在统治者所期望的纲常名教之中，削弱了潜在的反叛思想和势力。虽然这一时期科举考试已显出一些弊端，但还不像后世那样严重，总的来说，是正面作用大于负面作用。

在军事制度方面，隋朝和唐朝前期实行府兵制，唐朝中后期，府兵制废弛，开始实行募兵制，军事制度变化较大。虽然统治者力图依靠军事力量维护自身政权，但最终仍衰亡于藩镇割据之中。

府兵制是与均田制密切相关的一种军事制度，它起源于西魏、北周。隋室代周后，府兵制未变。隋末动乱，府兵组织解体。唐朝建立后，在全面推行均田制的同时，恢复和整顿府兵制，使之成为唐朝前期的主要军事制度。府兵制的特点是寓兵于农，充当府兵的卫士，主要来自均田制下21至60岁的壮丁。资粮自备，平时在家里从事农业生产，农闲时接受军事训练；主要任务是轮流上番宿卫和征防。府兵制的另一个特点是兵将分离，全国府兵在皇帝总领之下，统领于诸卫，但府兵的调发属尚书省兵部，诸卫长官无权直接调动府兵，平时将不专兵，战时应征，由朝廷派将领统帅，战事结束，即解甲归农，以此防止军将擅作威福。府兵分布的特点是“内重外轻”，唐朝府兵全盛时共657个折冲府，其中分布在首都所在地的关内道及临近的河东、河南三道的府就达526个，占全国折冲府总数的80%，充分体现了唐王朝

“举关中之众以临四方”的基本方针，并有效地保卫了京师和皇帝的安全。

到唐中叶，由于土地兼并的加剧，府兵制赖以存在的均田制遭到破坏，出现难以为继的现象，逐渐被募兵制所代替。唐玄宗时，由于府县府兵宿卫人员不足，曾招募 12 万弓广骑代替，之后以募兵代替府兵的规模越来越大，到天宝年间，府兵制彻底破坏，募兵制兴起。同时，唐玄宗出于对边疆用兵的考虑，在军事力量的分布上，也变唐前期的“内重外轻”为“外重内轻”，边疆地带节度使专兵的现象也随之出现，最终酿成“安史之乱”。唐后期的统治者，为了改变藩镇专兵、尾大不掉的局面，在不能恢复府兵制的情况下，采取了诸如派宦官监军、加强中央禁军等措施，但由于中央禁军（唐后期主要为左右神策军）的控制权落入宦官手中，又导致了宦官专权、手持废立的严重后果。在唐文宗时，曾密谋切除这一恶瘤，但因所托非人、行事不密而失败，这就是所谓的“甘露之变”。从此以后，在藩镇交互用兵、宦官专权作威的夹击之下，摇摇欲坠的唐王朝一步步走向衰亡。

## 经济社会的发展

由于国家的统一、制度的文明创新，隋唐时期经济与社会的发展是空前的。在许多方面都达到了封建社会所能达到的高度。唐中叶后，这种发展与进步遭到破坏，经济文化的重心由北向南转移，但在某些方面仍然保持甚至创造着新的发展势头。从总体上看，隋唐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个发展高峰时期。

农业、手工业以及商业贸易的进步与发展，直接推动着这一时期经济的繁荣，奠定着隋唐封建盛世的基础。

农业是封建社会最基础、最基本的产业。在以农为本的封建社会中，农业的兴衰直接关系到整个社会的兴衰。隋朝和唐朝前期，实行





古代风景

均田制和租庸调制，在较大范围内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公平赋税，减轻了农民的负担，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政府组织农民兴修水利工程，灌溉面积扩大，抗旱能力增强；生产工具不断改进，生产技术也不断提高和推广，使这一时期的农业生产迅速得以恢复和发展。隋文帝时“强宗富室，家道有余”，封建国家的中外仓库，无不盈积，西京太仓，东都含嘉仓、洛口仓，华州永丰仓，陕州太原仓等，所储米粟多的达千万石，少的也有数百万石；长安、洛阳和太原的府库所储的布帛，也各有几千万

匹。这些，再加上其他地方的储积，可供隋朝统治者支用五六十年。唐朝到玄宗时，百姓家中的储粮，大都可以食用数年，政府仓储的粮食，到天宝八年（749年）约为1亿石。当时的粮价降到历史上的最低价，且保持较长时间的稳定。但“安史之乱”后，均田制、租庸调制逐渐废弛，北方大部分地区的水利设施年久失修，人口凋敝，农业生产下滑。南方的农业生产，则因长期的人力、技术积累和开发，保持向上发展的势头，并支撑着中后期已经逐渐腐朽的唐王朝勉强运转。

随着农业的恢复发展与繁荣，手工业也得以发展。隋朝的私营和官营手工业中，都有达到很高水平的种类。丝织业中，蜀郡（今四川）的绫锦雕镂之妙，世人称叹，豫章（今江西南昌）出产的鸡鸣布，颇受消费者欢迎；制瓷业中，当时已有白瓷出现，并且能够制造玻璃，且工艺相当熟练；造船业空前发达。能够制造4层，高45尺，长200

尺的“龙舟”。唐代手工业的规模和水平，都达到一个空前的高度。纺织业是唐代主要的手工业部门。唐前期，丝织、麻织、棉织的种类和产量十分可观，成为国家租庸调中庸调的主要对象。唐后期，南方的丝织业仍有很大发展，丝织品的质量和水平，甚至超过前期制作水平。采矿业，尤其是铁、铜、锡等矿业，在整个唐代保持兴盛的状态，唐后期的银矿冶炼达到很大的规模和较高的水平。瓷器的制作中，越州的玉类冰，邢州的银类雪，釉下彩的技法开始使用，三彩陶俑为后世称道，由于技术的改进和产量的提高，瓷器开始在民间普遍使用。造纸术更为发达，益州（今四川成都）的麻纸，薄州（今山西永济）的薄白纸，扬州的六合笺，都享有盛誉：墨、砚、笔的制作，也出现了不少名品。

在农业和手工业发展的基础上，商业贸易也空前活跃起来。隋开皇元年（581年），隋朝统一货币，更铸五铢钱，解决了周、齐以来货币轻重不等的问题，便利了商品的流通。大运河开凿后，商旅往返不绝，促进了商业的发展。长安和洛阳，是当时最大的商业城市，成为国内外商旅云集之所；丹阳（今南京）、蜀郡（今成都）、江都（今扬州）、京口（今镇江）等城市，商业也很繁荣。唐朝前期，一些地方性的政治军事中心和水陆交通要冲，逐渐成为较大的商业城市。唐后期的商业较前期更为发达，长安和洛阳虽经战乱破坏，但很快就恢复了繁荣。扬州、益州、洪州、苏州、杭州、泉州、明州等城市，商业贸易活动日益兴盛。扬州、汴州（今开封）、长安还出现了“夜市”。在水陆要道或津渡之所，兴起了许多定期集市，俗称“草市”。在交易频繁的情况下，大城市中出现了柜坊，商人将钱存放在柜坊中，柜坊根据商人所出凭证代为支付，征取一定的保管费用。后来由于钱币铸造不敷使用，商人把货款交给本道的进奏院及诸军使或富家，取得文券，回到本地，执券领取，叫做“飞钱”或“便换”，类似今天的“支票”。

与经济繁荣互为表里，隋唐时期的基础设施建设也成就斐然，其中城市的建设和运河的开通，尤为突出。

作为隋唐王朝都城的长安，这一时期在前代营建的基础上，有了新的发展。隋开皇二年（582年），动工兴建大兴城（即长安城），一直到唐永徽五年（654年）外郭城完工为止，前后经历了50多年。唐代长安城周围70里，全城总面积84平方公里，等于今天西安旧城（明代建筑）的10倍，大于现在的北京旧城，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全城布局严整美观，由宫城、皇城、外郭城三部分组成，宫城为宫殿区，皇城为中央衙署区，外郭城从东、西、南三面拱卫皇城与宫城，是百姓与官员的住宅区，也是工商业区。在外郭城中，列置着108坊，由11条南北大街和14条东西大街分割而成。外郭城内还有100多座寺院，其中的慈恩寺最为有名，唐高宗时安置玄奘从印度带回的经卷而建造的大雁塔，就在慈恩寺内，至今保存完好，是举世闻名的古迹。

隋炀帝认为，洛阳“水陆通，贡赋等”，即水陆交通方便，各地到洛阳的距离相等，以此为中心，最便于控制全国。仁寿四年（604年）下令营建洛阳，以为京都。第二年，宰相杨素和著名建筑家宇文恺设计营建洛阳，每月征发男丁200万人修建，用10个月完工。新的洛阳城修好以后，隋炀帝把原洛阳城的居民和各地的富商大贾，都迁到那里居住，使之成为当时国内著名的商业城市和国际贸易的重要据点。虽然当时京城仍为长安，但隋炀帝却常住洛阳，洛阳遂成为政治、军事、漕运的中心，直到唐朝，洛阳仍保持着东都的地位。

在营建东都洛阳的同时，隋炀帝为了便利漕粮和军事运输，利用天然河流和旧有渠道，开凿了一条以洛阳为中心，沟通南北的大运河。全部完工后的大运河（包括隋文帝开皇四年命宇文恺开的由大兴城到潼关的300余里的广通渠）全长5000多里，是当时世界上最伟大的运河工程之一。大运河开通后，成为全国南北交通的大动脉，适应了当时和以后南北经济交流的需要，加强了南北的联系，促进了沿河流域经济的发展，对于全国经济文化的发展、交流和统一，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文化科技等社会事业的发达，与这一时期的经济繁荣有着必然的联系，并与经济的繁荣一起，构成隋唐时期经济社会的整体文明与进步。

这一时期的科学技术领域，发明创造层出不穷。在天文历算方面，唐初王孝通的《缉古算经》，第一次用解三次方程式的方法解决一些复杂的工程计算问题，高宗时李淳风等人审定并注解了 10 部算经，成为唐王朝规定的算学教本。唐玄宗时，僧一行完成的《大衍历》，比较正确地掌握了地球在绕太阳运行时速度变化的规律，他还与梁令瓚合作，创制了能够直接测量黄道坐标的黄道游仪，制成了以漏水转动的浑天铜仪，是后世天文钟的前身。在医学方面，隋朝巢元方等人的《诸病源候论》，隋和唐初孙思邈的《千金方》、《千金翼方》，唐玄宗时王焘的《外台秘要》，唐高宗时苏敬等人修定的《唐本草》，把这一时期的医药学推向一个高峰。在建筑技术方面，隋代工匠李春设计建造的赵州安济桥，隋代建筑家宇文恺、高龙义和唐代建筑家阎立德等设计的长安城，堪称世界之最。隋末唐初发明的雕版印刷术，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印刷术。

文学艺术领域，更是高峰迭起。以李白、杜甫、白居易等为主要代表人物的诗歌创作，把这一文学形式发挥到了极致。以韩愈、柳宗元为核心人物所倡导的古文运动和古文创作，一扫六朝以来柔靡浮艳和形式



古代风景

僵化的骈体文风，对中国古代散文的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这一时期出现的小说，以及随着佛经的大量翻译和佛教流传而出现的俗讲和变文，也为文学领域增添了新的奇葩，并为后世的文学创作开辟了新的途径。在艺术领域，以石窟寺造像，陵寝前的石雕。墓葬中的俑器为主要种类的雕塑艺术，如敦煌莫高窟、洛阳龙门、太原天龙山、四川大足北山等的石窟雕刻，唐太宗昭陵六骏的浮雕，以及唐代的彩陶俑，最能代表这一时期雕塑艺术的水平。阎立德、阎立本兄弟的人物故事画，吴道子的佛道画，张萱和周昉的仕女画，展子虔、李思训、李昭道的山水画。以及边鸾的花鸟画，韩混、戴嵩、曹霸、韩干的牛马画，把这一时期的绘画艺术不断推向高峰。欧阳洵、虞世南、颜真卿、柳公权、孙过庭、张旭、怀素等人各具特色的书法艺术，至今为世人称道。在汉族传统乐舞的基础上，借鉴边疆民族和邻近国家乐舞精华而形成的隋唐宫廷乐舞，更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精美绝伦，并广泛地传播到民间和周边地区，至今仍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哲学、宗教等思想学术领域的研究，也有很大的成就。宗教方面，汉代传入中国的佛教，从南北朝到隋唐之际，开始出现宗派，隋唐时期的主要宗派有天台宗、法相宗、华严宗、禅宗，各派教义互有异同，繁简不一。消长也不定。在隋唐统治者的提倡下，佛教广为流传，寺院遍布，僧尼众多，虽然唐武宗曾下令灭佛，但不久又兴盛起来，成为国中主要的宗教形式。道教在唐代也很盛行，许多著名的道士为皇帝所宠信，但由于道教多讲炼丹服食之术，主要在上层社会流行，其影响不及佛教广。西方的祆教（又称大祆教或拜火教）、景教（基督教的别支）、摩尼教（又称明教）、伊斯兰教等，随着这一时期中西方交通的发展，也相继传入中国。哲学方面，唐初的傅奕和吕才，以朴素唯物主义的观点，抨击宗教迷信；后来的柳宗元、刘禹锡等人，从不同角度，批驳传统的孔孟唯心主义的道统和人性论，力图正确阐释人与自然界的关系。宣传无神论和人定胜天的思想，具有时代的进步意义。学术方面，这一时期的史学和地理学成就最大，隋文帝时曾下令禁止私人撰辑国史，臧否人物。唐太宗则置史馆，修撰前代和本朝的

历史，并令宰相监修，使官修正史和宰相监修成为定制；唐代刘知几撰写的《史通》，是我国第一部有系统的史学批评和史学理论著作；唐玄宗时编纂的《唐六典》，唐德宗时杜佑编撰的《通典》，都详细记载了当时的各项典章制度，并开创了新的史学编纂形式和体例。唐宪宗时，宰相李吉甫撰写的《元和郡县图志》，是我国现存最古的一部舆地总志，史料价值很高；唐懿宗时，樊绰搜集有关云南地区的史料写成的《蛮书》，是研究今天云南地区各兄弟民族历史的最珍贵的文献；唐德宗时，宰相贾耽制作的《海内华夷图》，长三丈三尺，宽三丈，图上每一寸表示实际的100里。这个图虽已失传，但伪齐阜昌七年（1137年）时把它缩成《华夷图》和《禹迹图》，刻于石上，现存西安碑林，《华夷图》中所绘我国山川及平面地形的轮廓，大致和今天的地图相似，这是留传下来的我国最古的地图。

## 对外交往的扩大

隋唐时期，中央王朝与边疆各族和邻近各国之间，有战有和，实际控制的版图也随之伸缩。对外交往在社会生活的许多领域都呈扩大态势，成为后世称道的“盛唐气象”的重要内容和标志。

隋唐王朝主要出于维护和扩大封建帝国的主权与领土的考虑，在不同时期和情况下，对邻边民族和国家，采取了各种不同的措施，既有成功的经验，也不乏失败的教训。其中最值得提及的是灭突厥、和吐蕃、伐高丽。

隋朝初年，突厥贵族经常带领骑兵，在东起幽州、西达河西的界线上，对隋进行骚扰。隋开皇三年（583年），隋王朝派重兵打败了突厥，促使突厥内部发生分裂，形成以达头阿波为首的西突厥集团和以沙钵略突利为首的东突厥集团。唐王朝建立之初，东突厥经常侵犯唐的边疆，并把大批边疆居民掳去当奴隶。唐太宗即位以后，派大将李勣、

李靖带领十几万大军，分道出击，于贞观四年（630年）击败东突厥，俘颉利可汗，并在东突厥故地设置都督府州，置于唐王朝的控制之下。唐与西域诸国的通道，也随着贞观九年（635年）击溃吐谷浑而彻底打开。接着，唐王朝又派侯君集率军灭高昌国，设置西州，有效地控制了西域通道。唐高宗显庆三年（658年），发两路大军进击，消灭西突厥，在其旧境设置了许多府州，受唐王朝直接统治。隋唐时期中央王朝消灭突厥，击败吐谷浑与高昌等，总的来说带有防止骚扰、保障内部安定、发展东西贸易及开疆拓土的性质，具有进步意义。

吐蕃在今西藏高原一带。6世纪时，西藏高原上有三股强大的势力。西部是羊同，以畜牧为业；中部和北部是苏毗，以射猎和畜牧为主，部分地方也经营农业；西南部为吐蕃，已有较发达的农业。7世纪初，吐蕃的朗日论赞吞并了苏毗，他的儿子松赞干布又击灭了羊同，统一西藏高原。在松赞干布统治时期，吐蕃社会进步较快，他曾几次向唐请婚。贞观十五年（643年）唐太宗派李道宗护送文成公主入吐蕃，松赞干布亲自到柏海（今青海鄂陵湖和扎陵湖）迎接。唐、吐蕃通婚以后，双方的经济文化交流频繁，对各自经济社会的发展，都有一定的推动作用。松赞干布死后，吐蕃贵族征服了不少邻近民族，并曾一度攻占唐朝的安西四镇。但长期的战争使吐蕃人民疲于徭役，开始起义，被征服的各族也纷纷起来反抗。长安二年（702年），吐蕃赞普遣使与唐和好。景云元年（710年），唐朝又把金城公主嫁给吐蕃赞普尺带珠丹，唐、吐蕃又开始和好与交流。在整个隋唐时期，吐蕃虽与中央王朝有和有争，但唐王朝坚持以和为主的政策主旨，创造了妥善处理民族关系的范例。这一时期在处理与回纥等民族的关系上，也曾实行和亲政策，取得一定的成效。

高丽位于今朝鲜半岛。当时朝鲜半岛尚未统一，其北部为高丽，中部为新罗，西南部为百济。主要出于大一统的领土扩张企图，隋和唐前期，曾多次发动对高丽及朝鲜半岛的侵略战争，但败多胜少，对两国人民都造成灾难。

虽然隋唐王朝在处理与边疆各族和邻近各国的关系方面，有得有失，但在多数情况下，这一时期的边际关系是相对安宁的，国内形势是稳定的，经济社会的发展水平在当时世界上是领先的，这使隋唐王朝较前代统治者有更多的自信，敢于在更多的领域内实行开放政策，对外交往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扩大态势。

在经济领域，这一时期的中外商贸交易更为频繁。凭借便利的交通和繁盛的都市，中外商品贸易的范围和种类较前代更为扩大，出口商品除丝织品外，陶瓷、茶叶、纸张文具等的种类和数量明显增多；进口商品中，除珍珠、宝石、香料、药品、犀角、象牙等奇珍异宝以外，服、食等日用品也多了起来。由于对外贸易的发达，隋朝在京城建国门外设有四方馆，管理外国商人和国外贸易的具体事务；唐朝除了管理陆上贸易的机构外，又在广州设置市舶使，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海关机构。此外，隋唐政府为了扩大对外贸易，提高自身的威望，还实行一些优惠政策，对外国商人在交通食宿等方面给予优待，在“朝贡”与“回赐”的贸易形式中，也有明显的体现。当然，隋炀帝时对外国商人的“夸富”，则另当别论。

在文化领域，中外交流的范围更广，相互影响更大。仰慕于当时中国文化的灿烂，新罗、日本、越南等国曾多次派遣遣唐使、留学生、学问僧来中国，潜心学习中国的文化艺术及科学技术。相应地，中国的一些学者也走出国门，学习外国的文化艺术，其中唐朝前期的玄奘到印度、义净到印度尼西亚学取佛经，影响和成效很大；鉴真几次东渡，并长期居住日本，在宣教受戒的同时，在建筑艺术、医药等方面，也为日本人民做出很大贡献。通过中外学者、人士广泛的往来，这一时期中国的许多科技文化传播到国外，国外的一些先进技术也传到中国。特别是这一时期佛教在中国广为传播后，对中国当时的文字、文章、文学创作、绘画、雕刻乃至印刷和建筑等许多方面，都增添了新的成分。



最值得重视的，是这一时期的对外开放，已深入到政治生活领域，其主要标志，是外国籍和前来中国学习的外国人士，可以进入中国的政界仕途。如大食人李彦升对中国文化造诣很深，在中国参加科举考试进士及第，后来留在中国服务。波斯首领穆诺沙于开元时期两次来唐，被授予军职，留宿卫。天竺人迦叶济，唐德宗时任泾州大将试太常卿。新罗人朴球当皇帝侍从。高丽、百济也有不少人担任唐朝的武将，其中最著名的有黑齿常之、泉男生、高仙芝、王思礼等。日本文学家阿倍仲麻吕，在长安 50 余年，从校书郎一直到秘书监，得到很高的待遇。唐王朝允许这些外国人进入仕途，一方面是满足他们学习中国行政管理经验的愿望，另一方面，也从他们身上汲取各种可以资治的东西，并不惧怕对自身政治造成不良影响。这一现象说明，唐朝的对外开放的确是全方位的，充满了自信心的，达到了它那个时代所能达到的最高峰。

## 治乱兴衰的启示

隋唐时期的治乱兴衰之中，值得总结的历史经验与教训很多。对于各种具体的历史启示，我们将在本书以后的各篇中论及。这里只从宏观的历史角度，做一个概括的阐述。

统一国家的重建，以及较长时间的维护，表明秦汉建立的以汉民族为核心的统一国家形态，在经历了南北朝的治乱和隋唐的加工后，已成为历史发展的基本趋势。而隋唐时期，国家统一的长期实现，与这一时期采取的一系列维护统一的措施密切相关；分裂与割据的出现，也与统治者在一些重大关系上处置失当有关。

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事关统一与分裂的大局。针对汉末以来的实际，隋唐王朝建立伊始，都着力加强中央集权。三省六部制及宰相制